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4.021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精神呈现

王树森^{1,2}, 沈文凡¹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00032;2.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多层次展现了西北社会各界的优良精神风貌,在行记作者笔下,一些西北上层人物对于自身使命有自觉意识,对时代主潮持理解态度,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能坚定维护。由于不少行记作者曾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他们注意发掘普通移民、欧美传教士、科教界优秀分子乃至红色革命者投身开发建设西北事业时所表现出的优良精神品格。在与西北普通民众的广泛接触中,行记作者被他们的淳朴善良与坚毅顽强打动,竭力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富矿。行记作者万里远游,他们的笔记本身,也彰显了一类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家国天下的使命担当以及所受到的精神淬炼与提升,证明了西北大地对于培育伟大民族精神和崭新时代精神,能起到重要作用。西北行记的精神书写,让行记文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新的生命。

关键词:西北行记;人性光辉;民族品格;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4-0159-08

西北行记,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由东南或中原腹地前往地理上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诸省区的中国西北部出使、考察、赴任、采访时留下的纪行文字。先唐史籍中著录的陆贾《南越行纪》《张骞出关志》、班勇《西域风土记》等作,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西北行记,惜皆已亡佚。以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法显传》《宋云行记》为标志,这种以散笔单行文字形式真实记录“自己或他人出行的经历、见闻和感受”^①的著述门类始告成熟,历唐宋而迄明清,代不乏作。宋清两代,或因为兄弟民族汉代政权的分立,或由于勃兴的“边徼地理学”(梁启超语)之刺激,还出现过两次行记的创作繁荣。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有着久远历史的西北行记再次形成创作热潮。近百年间,从事西北行记撰著者众多,或为政要,或为硕学,或为文艺界名流,他们在万方多难的特殊时代里,不避艰险前往西北这一方人文厚重又民生至艰的特殊土地,并且在征程劳顿之际,依然笔记往来,为当时和后世留下一座认识和感知西北的富矿。和古代西北行记相比,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行记,

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层面的认知功能,而且特别显示出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具体文学表现的精细度,正是后者,让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行记具备了十分突出的思想价值与文学价值。广大行记作者在中华民族处在深重内外危机的环境中,万里长征,其使命既在于察访实际、发现问题,以引起开发或疗救的注意,更为了寻求民族自新自强的希望与信心。这就造成了广大行记作者,基于近代(鸦片战争直至20世纪上半叶)特有的时代心理氛围,对西北地区特有的有益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文化资源开掘,持有特殊关注,本文拟对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所着力呈现的主要精神光亮,进行梳理总结,以就教于方家。

一 西北上层人物的精神境界

处在近现代家国危机背景下的西北大地,灾祸频仍、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尖锐,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如此,这一方广阔厚重的土地并未就此落入绝境,生长于斯的万千民众以及来自各方的有识有志之士,仍然在上

收稿日期:2020-03-2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资助项目(2016M590250)

作者简介:王树森(1986—),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吉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李德辉:《论行记的内涵、范畴、体系、职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

下求索、竭力奋争。这些求索与奋争背后,展现的是既各有侧重,又同心共振的优良精神品质。其中,上层政治人物之精神状态对西北社会尤其具体引领作用,也因此是行记作者关注的重点。

(一)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展示了一些上层人物的为民情怀

如何纾解广大民众的现实生存困境,这是摆在近现代西北上层面前的首要问题。正如在西北行记中屡有见及的,一些政客面对民瘼,庸懒无为甚至推波助澜,加重了社会苦难,但毕竟又有大量政治人物能够持有勤勉救民的态度,表现出令人感动的担当精神。林则徐与左宗棠两位晚清重臣,均曾有过一段西北任职经历,从林则徐本人的《荷戈纪程》,特别是后来一些进入西北的行记作者的考访记录可见,林由于广州禁烟而远贬西域,却能在仕途失意之时仍潜心发明坎井以解决新疆农垦水源之急^①;左宗棠征西,虽为平息回事,但在进军同时亦注意一路广植杨柳,在兰州还筹建毛呢织造厂等近现代工商业,二人的有关建树,推动了西北工农业的发展。行记作者对林、左二人特别是后者在西北的善政详加铺写并予以诚挚肯定,目的就是表明,即便末代封建官员,“精神也真正有可佩服的地方”^②。进入民国,西北迭遭丧乱,民众更加生计无着,一些民国显宦在艰苦复杂政治环境中,仍冀图扶危济困。譬如杨虎城、邵力子、朱绍良等人任职西北时的积极作为,行记作者多有记载。1938年4月下旬,顾颉刚考察甘肃陇西,不仅罗列了县长孙振邦植树造林、督修公路、禁止缠足、整顿保甲、清除积弊等多方面治理成绩与计划,且称其“沉着刻苦,新时代之地方官也”^③。对这些官员在艰苦复杂环境中的积极作为以及蕴含其中可贵精神品质的深情记录,凸显出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重要精神史价值。

(二)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写出了一些上层人物的进步品格

西北大地人文厚重,但其负面效应则是思想保守、新风难开。行记作者游历西北,接触并批判了一些逆流而动者^④,更对相关政治人物可贵的进步表现多有标举。通过西北行记可见,一些西

北高层在任上积极推进具有近代化特点的公共事业。清代末任陕西巡抚升允,虽不赞同革命,但亲自主持建设现代化之黄河铁桥,却惠民被远,所以徐炳昶说他“功诚不可没”。民国肇建,新式教育、邮政交通和现代工商业,是西北地区启迪民智、追步时代的重要抓手,行记具体写到一些主政者在相关领域多方筹划的作为。更重要的是,相关政界人士在时代主潮面前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也被行记作者写出。近现代西北长期蒙受烟毒之害,有些官员顾及财源只能一味放任^⑤,但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中即专列“青省不种毒卉”一节表彰青海禁烟善政,其缘由,在林鹏侠看来,“此不得不归功于地方长官及绅老之长识远见。”^⑥一些少数民族上层的思想先进,尤其受到赞誉。譬如新疆的包尔汉,徐炳昶不仅称其为“不易材”,此后又因在其身边又发现新文化运动之际具有标杆意义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惊异之余,遂致感叹:“边境闭塞,居然能有新文化之书籍,不能不令人色喜也。”(《西游日记》,第361页)在宣侠父笔下,陇南俄拉草原的藏民上层,也对革命者所提倡的“民族的存在和独立所需要的文化”表示出“觉悟式的奋然”^⑦。1934年,申报记者陈赓雅赴西北采访,其《西北视察记》一书中,设专节表彰酒泉县长魏允之在任期间“努力庶政之改革”^⑧,特别是详细记载由魏氏主导的“酒泉之放足运动”,有关书写,特别是诸如“长识远见”“觉悟”“改革”等价值判断,显然包含着作者们寻获到有益于时的健康精神资源的欣慰。

(三)近现代西北上层人士的家国认同,在行记中也有充分表现

西北地广人稀、民族众多,生乱生变风险较高,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西北始终未曾流离,并且在抗日战争前后还被寄予作为战略后方的厚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绝大多数西北上层人士持有坚定的家国认同。通过西北行记的书写可见,晚清以降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西北上层人士,无论具体政治立场有何差异,在维护国家根本主权问题上,有些人物毕竟有其清醒的一面。杨增新

①林竟在《蒙新甘宁考察记》中云“坎井始创于林文忠公则徐”,对坎井之法详细介绍并作图示意。

②徐炳昶:《西游日记》,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74页。

③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④譬如新疆的金树人、甘肃的刘郁芬、阿拉善的蒙古王爷等人。

⑤如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中“朱绍良氏禁烟种棉谈”一节,即详述烟土屡禁不绝,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政困难。

⑥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⑦今秋(宣侠父):《西北远征记》,北新书局民国十九年版,第130、190页。

⑧陈赓雅:《西北视察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57页。

和盛世才两位军阀,于20世纪上半叶把持新疆政务数十年,作恶多端,但是通过西北行记的有关书写可见,他们面对近现代新疆被各种外国势力覬觐始终未轻易以主权作交易。1928年徐炳昶在迪化期间,多次听到杨增新表示对于日本侵华的忧虑,7月6日,徐炳昶面谒杨增新,其当日日记写道:“他(按,指杨增新)说他对于统一甚为高兴,至于个人的出处进退,不成问题云云。”(《西游日记》,第429页)^①1942年李焯尘访问新疆,在其《西北历程》中,他称盛世才“坚决明达……闻事勤劳……态度诚恳坦白”^②,又言其推行的“六大政策”属于“甚为合理”(《西北历程》,第83页),作者认识上虽有局限^③,但至少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某些西北上层人士能够自觉维护国家统一,这在当时复杂的内外局势中,是值得肯定的。西北行记中多方写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背景下,西北上层表现的救亡图存之志。他们或通过往来访者晤谈以求深入了解时势动态;或力邀各方贤达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向民众发表爱国演说,宣传国家观念;或直接向外界表示上阵杀敌的意愿。行记的相关书写,保存下西北高层政治人物的珍贵精神侧影。

二 各种外来人士的精神新质

西北地理僻远,宋元以降伴随国家重心东移,愈显闭塞。但是清代后期的西北边事继起与民国以后的时代风云激荡,使潼关洞开,大量东南土众乃至外国人次第西向。这些外来人士,除极少数属于高官显宦,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兵民商贾、旅行家、科考技术人员、传教士或类似于今天志愿者的公益人士。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提及大量此类外来人士,真切具体地写到他们在西北的生命状态,着力发掘他们身上所表现的精神新质,探讨这些精神新质在改造西北、发展西北中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 下层移民群体的生存意志

从1860年代起,清廷为应对回事,向西北大举用兵,带来了湘鄂苏皖兵勇的大规模西进;民国

之后,又有大量京津秦晋商贾往来于此。这种内地诸省持续百年之“商人、农民和退伍士兵正在重新迁入”^④的浪潮,对西北社会的具体影响不言而喻,而蕴含于这一体量巨大,有的还实现世代聚居的移民群体中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伟力,正藉由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记载而得以生动呈现。西北行记中出现了大量在西北谋生原籍内地的下层兵民商贾之身影,固然也写到他们的纠纷不法^⑤,但更多还是写到他们的刚健顽强之精神。1918年年末,第二次访问西北的林竞,写了河套附近一个直隶籍人王同春的垦荒业绩与坎坷遭际,特加按语评论,“王同春恃其胆力,不免巧夺豪并,为世所嫉。然而利用其机智,披荆斩棘,化土壤为黄金,为政府所不能为之事,吾人为国家地位着想,总觉其功浮于过……”^⑥,将千千万万像王同春这样的内地垦荒人的开拓性贡献揭示出来。林鹏侠于“一·二八”事变后旅行西北,希望寻求民族奋发之气以激励抵御外敌侵略,而当她到了兰州,不仅被西北下层回族官兵可望上阵报国的壮丽神采所感佩,而且尤其被一个发出“我辈一息尚存,不甘降伏,相约出关杀敌”豪言的天津籍饭店伙计所震撼,感叹“不图于此边塞之区,平民社会中,得闻此爱国之血性语”(《西北行》,第63页)。行记作者直面广大下层移民的艰苦人生,发掘其明识大体的宝贵精神,增强了行记的精神厚度。

(二) 外来志愿者的人道精神

晚清民国时期进入西北的外来人群中,除了为官或谋生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志愿者,这一群体虽然也和政界保持联系,有的还在后者支持下开展工作,但他们来到西北,从事赈灾、援医、支教、勘探、科考等各项事业,多属主动而为。由于行记作者中许多曾受到平等博爱观念的熏陶,有的本身即属志愿群体成员,因而他们会在文字中对于外来志愿者的人道精神特别留意。林鹏侠在西北,同以康寄遥为代表的志愿者多有过从,赞誉其为“富仁义之心者”(《西北行》,第15页)。行记尤其显著地写到外国传教士与科考人员在中国

^①正是在本日的谈话中,杨增新告知徐炳昶上月在东北发生的皇姑屯事件,而更加吊诡的是,次日,杨增新即遇刺身亡,凶手到底是谁,至今悬疑。

^②李焯尘:《西北历程》,文化印书馆民国三十四年版,第83页。

^③按,其实当时李焯尘对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三年计划”是否能实行,已持怀疑态度,既言“至于新疆实行此政策,究达何种程度,留待日后再述之”,又言在失去苏联的支持,“多少计划,已陷于纸上谈兵之境。”

^④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⑤民国初年,谢彬(晓钟)曾前往新疆调查财政,在迪化逗留一月,期间对移居于此的前清湘楚兵勇及其后裔的活动,多有探访,其《新疆游记》中多有记载,从中可见,这些内地移民习性上确有或懒惰或骄横的一面。

^⑥林竞:《西北丛编(上编·日记三四两卷)》,神州国光出版社民国二十年版,第59页。

的状态。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已有文学书写中,对于近现代百年在中国曾经深入活动过的外来人士群体,较多隐晦或仅做标签式点触^①,仅仅是到了最近几十年,有关艺术作品才开始对这一群体进行正面关注^②。行记不是小说影视,它给读者带来的思想或情感震撼只能依靠实录来实现。正是得益于这种实录,百年前居留中国的外来人士的真诚善良一面才得以保存。譬如林竞游历西北,行至内蒙五原附近,造访美国牧师费安河控制的小村落并与其本人直接交谈。从林氏的文字看,费安河懂礼貌、爱整洁、兴教育,在他的影响下,蒙古教民的居所内,“四壁洁净,不似一般蒙古人之肮脏”(《西北丛编》,第51页)。1927年,徐炳昶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身份率队考察西北,团员中有大量西人。徐在《西游日记》中对西方团员多有描写,特别是多侧面展现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先生的科学态度、坚定意志与友爱精神,令人动容。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特别是西北腹地而言,这样的他方人士的到来,无论具体功过是非,至少给一方闭塞的土地打开了一扇通向外界获取新知的窗口。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言行中所体现出的现代价值理念,对于当时的西北,相当于一把解开精神枷锁,启示精神新路的钥匙。

(三) 红色革命力量的英雄气概

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革命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直到红军长征进入陕甘,这支英勇无畏的红色队伍,才像马兰花一样在西北的黄沙戈壁间扎根。由于西北封建思想与反动军阀势力的封锁,民众对于这支队伍是隔膜甚至充满误解。一些西北行记的作者在与西北往来时,或因机缘不巧,或缘心理定势,对于这支队伍甚少着墨,即便是有所涉及,亦难免存有偏见。但是对于中国对于西北而言,这支队伍是全新的,她的精神气,无论如何无视,亦难以磨灭。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中央组织过西征,沿途遭遇回族反动军阀的残酷围攻,损失惨重,除少数人突围,绝大多数英勇牺牲,被俘者则受到非人虐待。1937年年初,护送班禅进藏的民国驻藏大员马鹤天抵达西宁,其1月24日日记,既写到六百余红军俘虏“衣服破烂、面容枯槁如乞丐然,十九无

履,以毡包之”的惨状,然而随即又笔锋一转,写这些红军“但皆能唱歌呼口号,步伐整齐,可知其曾受训练。且面带喜色,毫无惧容,询之大半为川人,多聪敏,有相当知识,实皆国家之有用青年”^③,以作者的政府高官身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能够对红军战士的命运持有矜怀,对他们的精神状态予以称扬,甚至做出“国家之有用青年”的肯定性评价,既显示出作者本人的勇气与见识,更说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确有超乎寻常的可贵精神品质,足以打动人心。进入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共二次合作,伴随着“到延安去”的时代风潮,这种可贵的精神品质,越来越真切地展示于世界面前。从《西行漫记》到《风景谈》,从《塞上行》到《延安访问记》^④,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形象风采借助此类文字传向世界,就是延安普通军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活力、团结、进步,也被行记作者充满感情地笔之记之。延安精神是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是红色精神发展培养的重要一环,有关行记能够在延安精神孕育之初即主动关注,这既是行记作者们的眼光与情怀所在,又极大提升了民国西北行记的精神价值。

三 边疆民族同胞的人性光芒

西北地瘠民贫,加上长期社会政治腐败,给民众精神的锻炼,带来了不利影响。行记作者往来西北,耳目所及,绝不只是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即便普通民众,特别是汉民族,有不少也在烟赌匪盗的精神泥淖中长期沉滞,自甘堕落,养成诸如懒惰、奸诈、凶残、麻木等不良习气。但是广大行记作者,也注意观察书写基层社会的健康一面,尤其对同样生活在西北大地的广大边疆民族同胞的优良精神品性,做了精准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既表现出可贵的民族平等意识,也包含有塑立正面镜鉴,作为改造国民性重要参照的深层考量。

(一) 边疆民族同胞的健康习惯

西北各民族生活于相同的历史时空,无论是美好还是苦难,都并不私覆偏载,但通过行记作者的文字可见,即便身处相同相似的恶劣自然或黯

^①这一点,类似于十七年文学中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南朝鲜士兵的描写。常彬等人认为:“与对美军的丑化描写相对照,(抗美援朝文学作品)对南韩军的描写就相对淡化、粗疏化,甚至缺席化。”(常彬、杨义《百年中国文学的朝鲜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②这一方面,影视作品似乎走在前面,如《芬妮的微笑》《庭院里的女人》等,书面文学中,莫言《丰乳肥臀》中滞留在高密东北乡的瑞典传教士马洛克,青年作家徐则臣新出的长篇小说《北上》中与京杭运河结缘的意大利迪马克兄弟,有关描写较之传统态度均有较大突破。

^③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二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195页。

^④以上行记或纪游散文,作者分别是埃德加·斯诺、沈雁冰、范长江、陈学昭。

淡社会环境中,比较起汉民族而言,边疆民族更呈现出某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1938年2月底,顾颉刚抵达甘肃康乐,其3月2日日记中有云:“此地居民,回六而汉四。回民彬彬有礼貌,见吾辈至,街上小贩皆恭敬站立;此等人有信仰,无嗜好,身体强健,团结坚固,如克加以适当之教育,实足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分子。”(《西北考察日记》,第200页)林鹏侠从登上津浦线上的火车直至入住潼关大安客栈,一路对沿途汉族民众的不良生活习惯多有批评,但是当她由陕西进入甘肃青海等地,则被边疆民族同胞的积极生活态度所感染,对回族男女知礼自律、勤劳爱洁的细节多有描绘,她称赞回族“夫妇平等,伉俪无间”的家庭制度,认为“诚足为法式也”(《西北行》,第93页),即有明显的以回比汉之意。在青海南部的苦寒之地,林鹏侠亲身感受了蒙、番诸族民众的直面苦难:“蒙番妇女身体强健而魁梧,且皆精骑射,喜操作,尚节俭,活泼而勇敢。”(《西北行》,第113页)作者尤其具体写番族女性和内地女性在对待生育问题上的不同精神风貌:“番民妇女之强健,虽在怀孕之期,而操作如故,不以为意。往往于山野牧畜时临产,同时或逢母羊产羔,均一同取而置诸怀,返帐,儿犊分置地上,若无其事然。反观内地妇女,产期内百病丛生,其主因大约在于不操作,少运动,致易养成惰性,身体亦缘而虚弱。懦弱相因,遂难振奋,若不速谋矫正,人种恐有日趋衰亡之危。”(《西北行》,第113页)番汉对照,描写与议论相间,其意显在是用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的积极生活态度,来反思东南汉族民众在近代化过程中所沾染上的某些“文明病”。

(二) 边疆民族同胞的淳朴天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内地主流文化界涌动着破除礼教束缚精神枷锁的浪潮。一方面,鲁迅等新文化运动领军者不断通过小说创作来批判国民性之恶,另一方面,又有沈从文这样以独特的“湘西世界”的小说建构来歌咏淳朴美好的人性^①。从关注对象的边缘性特征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行记作者笔下的西北有相似相通之处^②。晚清民国的西北行记中,多有对于边疆民族同胞原始淳朴天性的书写。譬如林竞1919年7月6日日记中,写到蒙古族人的热情友爱之状:“(蒙人)夜间……闻门外有人喊即起。如生人则升火烧茶以飧之,亲爱如素识。

汉人时有在草地遇驼疲不能行,则寄牧于蒙人。初不问相识与否也,其时日不问久暂。仅与以砖茶一块,或葡萄干以及少许布匹而已。若驼死,则留火印及驼牙,交所寄者以资凭信。此种扶危济困、诚信不欺之精神,只能于游牧生活时代得之,非敢望于近世号称文明之域也。”(《西北丛编》,上编,第321页)所谓“非敢望”,背后包含着对“近世号称文明之域”的深重失望。又如西北穷蹙,民众缺衣少食,乃至十四五岁之少女多处裸身无衣之境,行记作者写到了她们的悲惨,但同时又写到她们在如此窘境之中仍保持良好天性。林鹏侠《西北行》之“败屋中如鬼之裸妇”一节所写的那个裸衣母女,虽自身穷极,但仍对夜半投宿的作者勉力照料,“一片诚心,有足感者”(《西北行》,第42页)。陈赓雅行至临泽,看到无衣裤可穿的少女,本来也是“不胜惻然”,但旋即转笔写道:“然如是之女孩,殊少拥挤车前,每多并膝侧坐于阡陌,遥遥倾视。”(《西北视察记》,第249页)边疆民族同胞知礼谦和的精神风貌瞬间凸显。在许多行记作者的笔下,西北各边疆民族同胞的精神世界中,洋溢着直率、坦荡、热情、无私、不欺的健康元素,构成与“文明”社会虚伪狡诈奢靡的巨大反差。类似这些内容,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比比皆是,不能认为只是单纯的机械记录,要看到那些边疆游历者或行记作者们,在早已见识过扭曲变形的现代文明之后,对真醇朴素的人间至性的向往与怀念。

(三) 边疆民族同胞的家国意识

处在近现代中国复杂内外环境之中,边疆民族同胞是否具有坚定的国家观念和自觉的维护民族团结意识,是内地社会各界牵心的重要话题,也是广大行记作者考察的重点。1934年4月29日,陈赓雅行至内蒙草原一个叫四眼井的地方,偶遇一家“男为汉装,女则蒙饰”的迁居牧民,遂与之展开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记者问牧民“何处人”,牧民回答曰“中国人”,但当记者想进一步确认牧民是否为蒙古族时,对方却含笑回应:“蒙古亦中国,中国亦蒙古。”如此答案,对于高度敏感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内地知识界而言,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欣喜,所以作者随即置评:“此答虽有语病,尚具国家观念。”(《西北视察记》,第82页)1930年代以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仅充盈着亿万

^① 龚刚:《论〈边城〉的“诗语”风格与结构模式——基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视角》,《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沈从文的名作《湘行散记》,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行记。

首当其冲的汉族民众的心际,西北广大边疆民族同胞同样切齿愤激,“一·二八”事变之后西行考察的林鹏侠,在兰州等地多次碰到下层回族兵民向其当面表达愿意上阵杀敌,抵御外侮的报国之志,深受感染。而陈赓雅在西北采访,亦有相似经历。在白马寺,有一处回汉藏杂居的村落,其中一位藏民,直接表明自己对于日本人的痛恨,陈氏将藏民陈述理由的言论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那位藏民说:“我们不怕英美人,我们只痛恨日本人,因为日本把我们的东三省和热河夺去了,还要杀了我们的无数义勇军和老百姓!先生,听说日本只有我们的四川一省大,那我们去打它好了,十个人拼他一个,总算对敌了吧?”(《西北视察记》,第188页)可见边疆民族同胞在内心深处所持之同仇敌忾。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对于边疆民族普通群众优良精神品格的记载,涉及方方面面。姑复举一例为证,林鹏侠在青海,记录下不少土人之歌,这些歌谣,涉及抗日、立志、自立、戒贪、戒酒色、慎言行、尊老重经验、重真实、善言可贵、重春雨、图自强、戒争讼等多种优良道德品质的教育引领。这些歌谣的存在本身,即反映出广大边疆民族同胞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中,已积累下宝贵的处世智慧与价值准则,这些智慧和准则,有其超越具体时空的广远价值,行记作者将相关言论、行为和人物事迹记录下来,寄托着显著的启迪社会与引领民众的心理动机。

四 西北行记作者的精神提升

当西北行记作者以深刻的眼光打量、以深情的笔触书写西北伟丽山川孕育的丰厚精神资源时,他们自己的精神格局也在这童山荒岭的漫漫征途中得到感染,并实现多方面开拓提升。

(一) 直面苦难的意志品质

西北地理辽远又生态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逊于东南,进入19世纪后半叶,更是陷入长期政治动荡。广大民众的生存之艰与社会面的复杂混乱,可想而知。所谓“陇东苦瘠甲天下”(左宗棠语),虽只是指向甘肃会宁一地,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北贫苦程度之深。这样的环境,很容易给一些外来者的旅途带来严重干扰,甚至在心理上产生徘徊犹疑甚至知难而退的情绪(杜

甫诗云:“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类此),但是不下数十百种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存在本身,即表明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确能不畏艰险、龟勉向前。而那些饱含深情的行记内容,更具体生动地展现出行记作者直面苦难的意志品质。

西行旅途之艰,首先表现在旅行条件之恶劣。譬如住宿,由于基本建设之落后,除少数中心城邑外,大部普通市镇中的优良馆驿均十分缺乏。很多人不得不另寻它宿,即便是高官显宦也难有幸免。清后期赴任新疆的林则徐、陶模、裴景福、袁大化,官阶不可谓不高,沿途接待不可谓不周备,但是从笔录他们行程的相关行记可见,他们经常在不得不投宿于荒村野店的无奈中表现出对高堂华馆的渴盼。林鹏侠和1940年代初奔赴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均为女性,前者在行记中经常写到在乡野间就寝的仓皇不适,后者在其《延安访问记》中对轮船客舱拥挤、成都及西安旅社蚊蝇跳蚤肆虐描写十分细致,除此之外,舟车之劳、饮食之恶,以及如影随形般的匪盗之患,无不对这些平素“席丰履厚之女儿”(《西北行》,第3页)或养尊处优的上层人物造成严峻的身心挑战,确是辛苦备尝。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未退缩,而是表现出以苦为乐、自我激励的可贵精神。林鹏侠在旅行之初即高标其“素持不畏难、不苟安、不自私三义”(《西北行》,第3页)之人生信条,其后在途中每逢艰虞,即在心中告诫自己不可迟疑,如“明知前途荆棘,亦须冒万险以履之”(《西北行》,第30页);又如“张骞西行,卒成伟绩,彼苏武之辈,亦犹人也!余今方壮年,安可自馁以遗人讪笑乎”(《西北行》,第133页)。裴景福以戴罪之身远赴万里贬途,启程不久即饱受腹疾之苦,但途中依然谈笑自若,甚至每每作诗自解:“尘土欺人可奈何,帽檐斜倚自高歌……泾堤南畔千株柳,莫忘征夫载酒过。”(《发泾州》)^①一派旷达之神,在兰州居停数月间,他不仅承受了仆人来和早逝之殇^②,而且甚为珍视的友人藏品也不幸遇窃^③,惜恨之余,却也发出“几忘身在樊笼者,然皆不如今年胸中空阔,别无挂碍。人不来我亦不往,甚自得也”^④的豁达感叹。唐人柳宗元《敌戒》中云:“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对于西行的旅人来说,形形色色的拦

①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册)(卷二)》,(香港)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七年版,第17页。

②作者不仅详细记录其奴子来和从病重到不治的全过程,而且在处理完来和后事之后,又作《悼奴子来和》一诗缅怀。

③字画中有一幅《曹国公诰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御笔圣旨。

④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册)(卷三)》,(香港)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七年版,第21页。

路之虎固然带来连连不便,但是意志获得砥砺,精神有以淬炼,也是远征不易的一种有益补偿。

(二)救民水火的仁者情怀

西北大地恶劣的生存条件,深深触动了来访的行记作者。他们在自身正面遭遇行旅之艰的同时,更注意推己及人,将关心关怀的目光投射到生长于斯的万千各族民众身上。既感同身受地体会怜悯西北人民的悲惨境遇,又多方面展开实践探索,力求尽可能纾解民众危困。行记作者的能力有大小,往来西北有因公因私之分,和广大普通民众的接触也疏密有别,这就是他们的纾解行为的侧重点各各不同,但无论具体形态方式为何,都共同展现出一种高尚的仁者情怀。

行记作者西行之时,近距离感受到广大民众的物质贫困、人格遭辱与精神压抑。对于耳闻目睹的惨状,他们既表示真诚的矜怀,更给予力所能及的救助。林鹏侠一路西行,在咸阳城外,面对“一幅流民图,惨陈于目”(《西北行》,第26页)的景象,她情难自己地发出“自恨不能如化饼之基督,以果我苦同胞之饥肠。力绌心馀,惟有一洒同情之泪而已”(《西北行》,第27页)的无奈感叹,停留陇东静宁县期间,林氏造访山村居民,先探访一位贫病老妪并赠以饼干,继而又在一处破黑小屋内见到裸而无衣的母女三人,痛心之余,救济以银元两枚,并自我发问曰:“余安得化百千万亿法身,来拯此辈无告之人于深渊之地狱乎?”(《西北行》,第41页)这些举动与念头,背后都体现出西来的行记作者因实际经历而萌生的悲悯情怀。由于生计艰难,当时许多年轻西北女性被迫落入黑暗深渊,但是面对这一群苦难中的女性,来访的行记作者不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表现出难得的尊重。1932年,一个因事从兰州去敦煌出差的名叫明驼的作者,将沿途见闻写成《河西见闻录》一书。该书打破了人们视西北为“世外桃源”的印象,而力求“以纯客观的态度”记载西北社会沉重的一面^①。在书中,作者写到一些地方官僚玩弄女性的丑态,并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意志:“我正以他们是本地的姑娘,应当和他处女性的人格一样的被人尊重,所以不能接受

这一套呀!”^②西北行记的作者还揭露了有关民族地区的上层恶势力^③对普通民众的精神的残酷压抑,对这类势力进行无情指斥。这些鲜明激切的态度,在当时污浊不堪的社会空气中,无异于一发除霾去尘的重磅炮弹。如果说这些言行,尚着眼于具体的人物事件,那么充盈于西北行记中的对于西北整体社会局面的堪称详尽深入的调查、判断、思考与建议,就更是行记作者救民于水火的情怀意志的全方位体现。

(三)引领时代的使命自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样一个既风雨如晦又新风激荡的时势中,西北社会无疑是落后的。在此背景下主动前往西北的旅人,既因为大多数均受过西方现代文明洗礼^④而对民族未来持有较为进步的态度,也缘自行走西北得以亲身感受西北的自然社会之艰虞,思想深处的引领西北赶上时代步伐的思想自觉,得到了强烈激发。行记作者希望引领时代进步的意识,体现在许多具体而微的言行中,譬如有的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在西北从事教育、矿产等事业的调查^⑤,有的作者在与西北军政要员的交往中给出除旧布新的中肯建议^⑥,有的作者则将有关认识思考融入沿途观感的记载,这些内容共同将包括行记作者在内的晚清民国时期西行的知识界人士的特有时代精神风貌凸显出来。这其中,若论表现最鲜明的,应当首推知识分子的广场活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或是居庙堂之高,或是处江湖之远,但是到了近代,在江湖与庙堂之外,知识分子又从西方引进一个既非封闭又不依附的能够较为自主地开展启蒙国民使命的实验场域:广场^⑦。这个广场,在不同时空环境,面对不同接受对象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譬如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当时的出版业已较发达,知识分子会充分利用报刊媒体发声,而在西北腹地,则又主要依靠演讲向民众施予影响。许多行记作者,或应当地人士之邀,利用集会、节庆、迎送等各种场合,在学校、讲堂、寺庙乃至乡村戏台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或具体地直接接触西北各界

①明驼:《河西见闻录》,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附),第96页。

②明驼:《河西见闻录》,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附),第125页。

③如谢晓钟《新疆游记》中写到的遍布西北各地的乡约以及新疆本地的阿訇。

④即便是林则徐、陶模、袁大化等清朝官员,虽然维护封建统治之心堪称坚决,思想上也不无开明之处。

⑤如著《西北漫游记》的侯鸿鉴、著《西行记》的顾执中等。

⑥如林竞、徐炳昶、林鹏侠等。

⑦陈思和的一系列论文讨论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广场意识”,如《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价值取向》,载陈思和《思和文存》,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3-12页。

甚至是最基层的民众,在切近晤谈中进行开导指引,注入其中的基本理念就是希望西北各界相互合作、激扬志气、守土爱国、发展教育、追踪时代。邵元冲、顾颉刚、马鹤天、宣侠父、陈赓雅、陈万里、林鹏侠等人,都在西北多次发表过引起轰动效应的公开演讲,他们本人或随从将演讲盛况笔录之后,随即寄往东南并公开发表、出版,使更多的东南民众得以知晓西北社会境况。这些举动本身就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品格的体现,而有关行记出版后,当时许多政学等界知名人士主动题签、作序、评论^①,以示表扬支持,有的热心读者还踊跃给著者或组织者写信,给予很高评价。这些热烈社会反应则更说明,行记作者在行走西北与撰述行记的具体辛劳中所收获的精神果实,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产生切实的影响力。

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行记走过了至少1500年的历史,但是整个古代的行记著述,正如顾颉刚所言,由于“并不是他们(作者)预先规定了一种目的,去努力寻求得来的”^②,所以尽管在记述道里行程、自然景物、见闻感受等方面,古代行记确实呈现出不断由粗疏走向细密的总体态势,然而没有足够的精神元气支撑,亦确为其天然的短板。只有到了近代,到了古老民族首次被卷入世界大潮之中,到了先进分子有机缘在积极向外看的同时反观自身之时,这种古老的文学样式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它们所绽放出的顺应人民期待、契合民族特质、代表时代方向的精神光芒,也才终于绚烂璀璨。

The Spiritual Presentation of Travelogues about the Northwest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Shu-sen^{1,2} & SHEN Wen-fan¹

(1.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00032, China;

2.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orthwest travelogues showed the fine spirit and features of various circles in northwest society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works of the travelogues, some upper class people in northwest China had a conscious awareness of their own mission and an understand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main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y steadfastly safeguarded the national unity. As many writers of the travelogues had been baptiz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 the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ordinary immigrants, European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outstanding members of the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even the red revolutionaries when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northwest China. In wide contact with the ordinary people in northwest China, the writers of travelogues were moved by their simple kindness and perseverance, and tried their best to invent the spiritual wealth contained in them. The travelogues, written by the writers who had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also highlighted the mission of a class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refinement and promotion they had received. It was proved that the northwest land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brand-new spirit of the times. The spiritual writing of travelogues in northwest China gave a new life to the style of travelogue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travelogues about the Northwest of China; human nature brilliance; national character; spirit of the time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譬如谢晓钟的《新疆游记》,即获孙中山先生作序;陈万里的《西行日记》,由胡适题签;林鹏侠《西北行》卷首,除有多篇名人题序,还刊印了21首各家旧体诗题辞。

^②顾颉刚:《陈万里〈西行日记〉·序》,陈万里《西行日记》,朴社民国十五年版,第1页。